

第一章 双语 教育概述

一、引 子：高潮迭 起的英语教 育（三则）

外语，特别是英语，是目前中国人生发展中备受重视的热点之一；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英语科目也备受关注。如何学好英语，怎样教英语是本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一）英语的通货膨胀时代^①

1989年，原籍日本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用英语写的《长日留光》（*The Remains of the Day*）得了英国布克奖；1999年，20岁才开始学英语的中国人哈金写的《等待》（*Waiting*）获全美国国家图书奖；2002年，印度种的奈保尔（V.S. Naipaul）以后天修来的英语领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用英语写作的外国人成为英语语言大师的比比皆是。全世界大概没有

^① 转自《文汇报》 2002年4月11日，作者毛尖。

一种语言像英语那样被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繁荣着，这保证了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硬通货的地位。甚至教皇保罗二世到中东去朝拜基督的圣迹时，他向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讲话，用的不是拉丁语，不是阿拉伯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他自己的母语波兰语，而是英语。教皇也用英语讲话！

在中国，不会英语几乎就像囊中羞涩一样，所以“李阳疯狂英语”畅销不衰，李阳巫术般的演讲激动了学生、商人、士兵，排山倒海的听众跟着他用英语一齐喊：“我热爱丢脸！”据说大声地、不怕丢脸地讲英语是他的英语学习经验，李阳自己就是藉此从一个英语不及格的自卑学生变成了中国民间的首席翻译，而他的抱负是让 3 亿中国人开口讲英语。1999 年，电影人张元为他专门拍摄了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疯狂英语》，李阳的演讲场面犹如崔健的摇滚现场，英语的魅力被无数听众捶胸顿足地放大了，那个英语传播狂人的事迹在世界的各大传媒出没。学习英语！学习英语！

是的，整个世界都在疯狂地学英语，学一种如同汉堡包那样简便的英语。而中国的新东方学校正令人艳羡地配制着英语巨无霸。新东方向全中国的莘莘学子允诺托福允诺 GRE 的百分百突破。“新东方单词”“新东方语法”“新东方阅读”走进书包，取代了莎士比亚，取代了乔伊斯。

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汉堡包的繁殖，因为它容易到手，而且实用。在这种产品身上，有两个既时髦又重要的主题汇合了，一是全球化，一是本土化。但是，就像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世界》（*Small World*）里说脱衣舞那样，当我们接住英语世界抛过来的一个眼神或一根腰带时，我们便自以为拥抱那个英语世界了。不是这样的。英语汉堡包绝不像它所宣传的那么感人、纯洁，它是狡黠的，也是有伤害的。“万恶的英语”以强势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改变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格局，虽然文化

的国际性接轨有着让人无比兴奋的一面，但是文化的移植无疑是严格受制于全球化经济秩序的，利润与文化的亲密共谋推广的是英语快餐文化，伟大的英语文学传统却被卡在海关了。

这一切都已经真实地发生了。当互联网、汉堡包和好莱坞以无法抵御的力量进军世界的各个角落时，英语的通货膨胀时代也随之降临了。传统英语世界里的很多词失血了，不再能够用于交流；新的犹如电报密码一样的英语单词和英语语法在网上流行，牛津剑桥的文学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的英语在互联网上失声了。就像巴巴拉·沃拉芙（Barbara Wallraff）在她的文章《英语能征服世界吗？》中说的，“当英语作为一个整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之时，典型的操英语者的语言经验却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化。”所以，英语的全球化导致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即是说，当两个人用英语来进行超出互联网基本词汇的交流时，英语就不一定是有效的语言了，他们就又变成初民一样，需要借助于身体语言。我们用英语跟机器交流得越多，我们对语言的要求就越简单；同时，英语也就更加贬值。这些，一半是英语在各民族凯旋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一半也是全球化的无情勒索。

三四十年来在中国，文学和电影对于那些中英夹杂的留美留英博士多有讥讽，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曹禺的《日出》都对这些人有过漫画式描绘，这些作家在力图守护中文的纯粹时，也守护了英文。说起来，中英夹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当我们只会用英语吐出“我爱你”的意思后，我们无疑忽略了“ I love you”这三个字对英语的促销，而英语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以——比如中文的通货膨胀——为前提的；“伊妹儿”（email 的中文音译）这样的词不就像假钞一样无意义吗？现在，互联网在以更快的速度发行并更新它的英文货币，全世界都被迫使用这种粗俗但便捷的东西，它夺走了语言的记忆和岁月的芬芳，因此它也不可能经历读者的心跳和眼泪，没有诗意的接触，也无所谓死亡，最

多就像早年在中国发行的大量袁大头伪币一样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

这一切，让我想起传媒对石黑一雄的一次访谈。《纽约客》记者说他的写作完满地结合了“从奥斯汀和狄更斯以降的英国传统和当今全球文化”，问他是如何把英文写得比当代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地道时，他低下头，说他其实有一个永难愈合的童年创伤：“不管我现在说着多么好的英文，我总无法忘记五岁那年，刚到英国，为了成为一个英国小男孩，我需要多么艰辛多么谦卑地去学习周围人的发音。”英语是这样练成的。

（二）中国为英语‘疯狂’^①

在今日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当问到最贵的商品是什么时，或许你会有些茫然，但当问及什么是最昂贵的知识时，相信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是“英语”。的确，英语不仅是中国人认为的最昂贵知识，恐怕也是一种最昂贵的商品之一，他影响到你的升学、晋级、出国、经商和光辉的未来。如今，中国因改革开放使经济一日千里，外国公司大举登陆中国；如今，不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上海又申办世界博览会成功，这些犹如一块块巨石击天，使中国人学习英语骤然“高烧”。英语在中国也骤然“市价飙升”，日益显现出惊人的“身价”。过去有过“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如今变成了“学会英语计算机，走遍世界也浪漫”。中国人学英语再也不只是为了出国，也不仅仅是个人为了当上公务员，而是发展经济，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进入地球村。中国教育市场中的英语教育产业迅速兴起，蓬勃发展。

^① 本节摘编于南文英：“中国为英语‘疯狂’”，《教师博览》2002（12）。

1. 留学热使英语市场火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出国热，初展中国英语教育市场峥嵘，使精于此道的老外犹如发现了巨大的“摇钱树”，喜出望外。80 年代初英语热在中国兴起，中国人要走向世界，要留学，要与老外谈生意，有英语者工资大增。各种英语教材，原版的或是影印本的还是翻译的，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最初流行最广的要数《新概念英语》、《英语九百句》、《核心英语》等。而销售量最大的莫过于英语电视教学片《跟我学》教材，其发行量据说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留学首先要通过英语托福考试，英语热也随留学热升温。80 年代初仅有几百人参加托福考试，几年后参加托福考试、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及企业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的人数成倍增长，到 90 年代已达每年 20~30 万之间，出国留学人数也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

留学热孕育了中国英语教育产业，90 年代中国各种行业已达到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惟有英语教育市场蓬蓬勃勃，方兴未艾，各种英语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世界所震惊。

2. 英语市场财源滚滚

90 年代后，先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民收入增加，中国高教入学人数太少，多数人选择留学而致使英语培训进一步火爆，其中新东方英语学校脱颖而出，使中国英语培训从“自由阶段”走入“垄断阶段”。新东方创办于北京，创始人俞敏洪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也同千千万万中国学子一样希望留学美国，在签证被拒后创办英语培训班筹集出国经费，第一次仅来两个人。于是他开办免费班，结果一个课室挤进了 300 余人，被迫搬到操场上课。高效的教学产生奇特的效果，1993 年新东方藉此在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屋中诞生。两年后，新东方就培训了 2 万多人，5 年后每年培训学员均在 15 万人以上，70% 的中国北美

留学生是新东方培训过的学员，开办 7 年，培训学员达 100 万以上，成为中国英语培训的“巨无霸”。新东方的声名已与中国著名大学并驾齐驱，它编写的《GRE 词汇精选》被称为留学考试的“红宝书”，一批既了解英语教学规律又熟悉西方的教育精英聚集到新东方的旗帜下。

走向新世纪，中国外语教育市场出现了群雄竞跃的局面。据统计，全国英语培训机构有近 4000 家，仅上海就有 1000 余家。位于太平洋百货的环亚西文——上海韦博培训中心学习半年英语的学费高达 9980 元，一年打折 15000 元，5 个级别全学完 26000 元，学员超过 200 人。新东方在新世纪遇到了新的挑战。例如，新崛起的华尔街学校，它瞄准中国 90 年代英语在就业上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高档的 6~9 级英语水平考试，这是国内外高级白领阶层的基本入门考试，华尔街 6~9 级英语培训费用是 2 万元人民币，每期可容纳 1 万人，其培训营业额之巨，与新东方的平民色彩不可同日而语。在龙梅镇广场 9 楼的上海华尔街英语四达培训中心 2800 平方米的大厅，被分割为许多多功能课室，一个级别 48 课时，学费 7300 元，学员超过 2300 人。

然而，就平民英语培训而论，在规模上新东方遇到的另一劲旅是被誉为中国英语“教父”的李阳，迄今为止在人数上无人能与之抗衡。几年前，李阳在北京一家体育馆推出他的“疯狂英语”，2 万余人随着手持麦克风的李阳的手势与口令，喊出阵阵震耳欲聋的英语声浪，犹如爆发了人间英语地震，至今已有 1000 万人参加他的“疯狂英语”活动，据说此举可克服惯来不敢开口讲英语的障碍。李阳的理想是“让 3 亿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疯狂英语”已越过太平洋，影响日本人和韩国人，大有继续蔓延之势。

在挑战面前，新东方也大力开拓市场，2001 年出国考试培训收入的比例下降到 40%，主要收入转向 4~6 级英语培训、国

内研究生考试英语培训以及基础英语培训。2002年新东方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培训比上年上升1倍，达到8000多人。特别是英语口语收入一人一天有300~600美元，为此新东方开设了口语课，一个月学费3000元人民币，第一期招生200人，广告一出，立刻爆满。此外，新东方还办起网络英语课程，适应分布全国各地的4~6级考生的需要，网络课程的收入1/5来自4~6级考试培训。新东方的总战略仍然是靠学员总量占领市场，2001年新东方的学员超过25万。

3. 学校英语浪潮澎湃

英语热的最新浪潮是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广泛全面参与。过去，英语在初中才开设，教学方式传统。2000年开始的中小学课程改革使英语松了绑，随着英语热而进入市场，从而掀起一股最强有力的浪潮。教育部2000年明确提出，凡有条件的小学可在一年级开设英语课，成为推动英语热的最大导火索。^①如今，中国城镇的幼儿园只要与英语接触，就会出现火爆场景。就在一些地方为儿童学英语以及双语教学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争论不休时，2000年辽宁省教育厅已正式发出通知，全省主要小学自一年级起逐步开设双语英语教学，以适应加入世贸对中国的挑战。2000年上海市逾80%的小学一年级开设英语课，^②至2003年这数字已上升到90%以上，而且基本上是施行双语式的英语教育，其发展可谓为中国之最，教育部门还为此开设双语教师培训机构，为英语热推波助澜。有未来学者宣称中国的未来将是上海的未来。有人估计，仅北京一地，至少有10多万儿童在学英语。2002年初北京举办全市少年儿童英语大赛，参赛人数就达5万余人。广州的儿童学英语更加普遍，各种中介培训机构的参

① 见《教育文摘周报》2000年12月13日。

② 见《文汇报》2000年1月24日。

与，使广东省出笼的“一费制”也相形见绌。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同美国、芬兰及中国香港等合作的“综合英语教学实验项目”虽然仍在小型实验阶段，但却能以其新颖的教学设计和实际有效的教学效果，使所在实验点（甚至是农村乡镇）掀起英语热，并影响到江苏等省。如今，各种私人学校、民办学校利用其灵活体制，借英语热而大力扩展教育市场；国外的各种培训机构也纷纷登陆中国，提供外资企业认可的剑桥英语证书，出国留学需要的托福、雅思考试，中国大学承认的4~6级考试，以及初学者所需要的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等方面的服务。

中小学的英语热还在于，相当多的民办私立学校几乎都以到国外继续求学为号召力，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生提供各种到英语国家学习的机会。在北京至少有上千家英语培训机构涉足中小学英语教学，广东和上海的这些机构也呈现出有多无少的趋势。中国英语教育市场有多大？除正规教育之外，初步估计仅英语培训市场大约就有两亿户，专家认为这一数目一点也不为过。这其中一半为中小学生，即1.5亿，两三千万大专学生以及各式各样的成人自考学员以及全民英语运动参加者。江苏等省规定40岁以下的公务员都必须懂得英语。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说，北京每年英语培训收入应在20亿人民币之间，以此算来，全国每年的培训费至少在200亿人民币之上。

4. 英语市场在竞争中扩大

近10年来，各路大军不断进军中国大陆英语教育市场。在台湾经营“空中英语”40年的彭蒙惠在大陆已进行了10年的奋斗，其教材发行达30多万册；另一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徐薇也先后登临大陆，刮起不小的徐薇英语风。如今，世界各国的洋机构也纷纷抢滩中国英语市场，其情其景更加迫不及待，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名义举办的英语培训机构在广东比比皆是，真可谓有“琳琅满目”之感。此外，为大家所熟悉的在中国的各种英语机

构还有芝麻街英语、剑桥英语、西门子英语等等。现在，因版权问题与新东方打官司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教育考试服务机构——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也坐不住了，与中国德泰集团合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要打进中国教育市场；有 36 年历史的英孚（EF）也于 5 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乌鲁木齐、昆明、青岛等地设立了教育机构，主要目的都是要分享数百亿的中国市场。上海的英孚教育 2 个月的学费为 1200~1400 元，报名者众多。专家指出，竞争也带来新的发展，近 10 年间中国英语教育市场将每年有 30% 的增幅扩张^①。其中外语出版也将成为中国英语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年有 300 亿营业额。在中国，10 年前也只有北京外文出版局出一些对外传的书刊及《人民日报》主办的《中国日报》；如今，地方也开始经营英文书刊了，大小各种报刊已达 50 余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连《比较教育研究》这类研究性学术刊物也在积极筹备出版外文版。一些外国机构也在蠢蠢欲动，有的已取得有关部门的认可。当然，在外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的培训机构也加紧向外扩张的工作，新东方已在加拿大成立多伦多分校，主要针对华人子弟的各种考试需要。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人世的进程，中国的英语教育市场会有更大的发展。

（三）谁能听懂你的英语^②

在日本的街道旁，70 岁的老人会用英语为你指路；在泰国的沙滩上，卖沙滩裤的小贩会用英语告诉你一条裤子 10 块钱；在德国的修车厂，机械工程师会用英语告诉你这辆汽车哪儿坏

① 此数据来源于《北京青年报》2002 年 12 月 29 日。

② 黄艺：“谁能听懂你的语言”，《教育现代化》刊首语，2002 年第 6 期。

了；但在中国，我看到的又是另一回事。

有一次，一个大学的高材生去商店买东西，碰巧一个外国人想买蛋糕，问店主多少钱，店主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告诉外国人一个蛋糕两块五。学生挠挠头，楞住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念了十几年书，居然连两块五的英文都不会说。

还有一次，我在学院听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主讲的是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报告完毕后，这位美国学者留下半个小时让大家提问，但由于场内没有翻译，大家都得用英语直接交流。一位研究生把他事先写在小纸条上的问题读了一遍，美国人想了一下说：“对不起，您可以大声点说吗？”学生捏着手中的纸条重复了一遍，美国人想了片刻说：“能不能再说一遍呢？”场上已经不安静了，学生硬着头皮又读了一遍，美国人脸上带着抱歉的微笑说：“真抱歉，我还是听不懂。”场上爆发出低沉的笑声。

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这不由让我发出疑问：我们到底能说多少英语？我们的英语又究竟有几个外国人能听得懂？现在不是许多城市从小学就开设了英语课程了吗？中国留学生的 GRE 成绩不是全世界第二吗？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就说不清英语呢？答案很简单：我们的教育并不重视口语，对听说方面的培养远远落后于对读写方面的训练。如果只会阅读、书写而不会用语言来交流，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意义。

语言终究是要开口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笔和纸代替一辈子。一门语言学了近 10 年，想说些最简单的话时，却不能脱口而出或让对方听个明白，是该反思我们教育的时候了！我们的学生学习外语到底是为了对付外国人，还是为了对付中国人自己出的考卷？

落后不光是知识上的滞后，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也会使我们落

后。这一误又是 5 年、10 年甚至更长，真正误不起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国家。试想，当信息和机遇以分秒计算的频率擦肩而过时，游离在我们掌握之外的何止只是一门外国语言？

二、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

随着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提高外语教学水平、培养更多外语人才就成为推进国际交流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外语教育中双语教育（或教学）的问题再次引起国际外语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本书拟从双语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探讨外语教育的双语教育问题。

（一）双语教育及其演变

双语教育很早就已出现，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及工业革命后，随着世界贸易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多，双语教育开始流行并发展了起来。澳门在 16 世纪开埠后不久就成为双语教育中心而带动了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流和发展，从而澳门成了远东贸易中心并由此红极一时。香港开埠之后，也逐步成为双语教育中心，也同样给香港带来繁荣和兴旺。新加坡是现代双语教育重镇，新加坡也从推行双语教育中走出种族争端，并与世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得到空前未有的繁荣。实际上，在较发达的地区，随着不同的开放政策，都会相应地发展双语教育，并构成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

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双语教育主要指的是进行两种不同语言的教育，一般以双语教学为主，有些学者对此并不做严格区分。而国外则通常采用“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很少用“双语教学”，这反映了国外把双语看作是一种比教学更广泛更重要的教育活动。不过，从其表达

的意义上来看，国内常称“双语教学”，尽管主要从教学的范围来理解这种活动，但两者所要说明的意思基本是类似的。这点仍须注意，但本书在探讨这种问题时不做严格划分，只是在于使用之方便。卡明斯指出，双语教育如按目标来定义，指的是为促进学生两种语言技能而设计的教育课程。“‘双语教育’这个词通常是指在学生教育生涯的某一阶段使用两种（或者更多）教学媒介语。这两种语言被用来教授科目内容而不单纯是语言课程本身。”所以，双语教学，一般而言，是指一种使用母语以外的目的语作为教学语言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从而达到学会目的语，发展多种语言能力的教学模式。^①但是，双语教学所要学习的外语与学习同属本国官方语言的第二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近来一些研究认为外语与第二语言有类同性。这些均可进行讨论，这里仅讨论属于外语教学的双语教学。

台湾张湘君教授曾对外语与第二语言做了区别。她以英语为例指出，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即英语作为外国语，与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即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是不同的^②。她说：英语作为外国语，“指的是外来的语言，既然是外来的语言，就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语言，也就是说，它不是官方语言，不是报纸上用来沟通的语言，也不是求职考试必备的条件，更不是老百姓主要讲的那种主流语言”。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可以说，在中国，英语是地道的外语。张教授进一步指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则指儿童学习了一种母语后，再学一种新的主要语言之一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一般是很重要的官方语言。如美国的双语教育主要也是指少数民族裔在学原种族母语的

① 卢丹怀：“双语教学面临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10月。

② 张湘君著：《英语亲子通——孩子学英语有绝招》，[台湾]三之三文化出版1999年，第14～19页。

同时学习英语这一美国惟一的官方语言。再如广东人的粤语与普通话，粤语是第一语言，普通话是第二语言，但却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在中国，南方各地的方言几乎都是母语，如广东的粤语、福建的闽南语、上海的吴语等。

(二) 双语教育的发展

由于外语与第二语言的差别，使外语学习比第二语言要困难得多。首先，第二语言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不仅语言环境好，在境内任何官方文件、印刷品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俯首可见，是作为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对学习者的发生影响。特别是在像中国的汉语这类单一官方语言国家，离开这种语言就无法生活。即使如新加坡、加拿大、芬兰等多官方语言国家，每一种官方语言的存在都具有相应的生活价值，都有相应的生活群体和使用价值，既然是官方认定的使用着的语言，因此也必然存在着较为丰富的语言环境。其次，第二语言有较好的使用机会和使用价值，学习这种官方语言，才能进入所生活的社会，从学习语言开始就等于在使用语言。多官方语国家的这些第二语言的使用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也具有良好使用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路标等，都具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价值和条件。但是作为外语可就少得多了。例如，像中国人学英语，主要的是在课堂上学习，真正应用是成年后偶然有机会出国，其余的作用就只能是应付各种晋级考试等，特别是开口说话，交流的机会相当少。这就决定了学习外语与第二语言之根本差别。语言是需要一种很自然的条件下，通过耳闻目染中习得的，中国的外语，如果没有家长对儿童未来的殷切期望和“坚强意志”，我想是很少有儿童能学习成功的。

由此可见，在双语教育中，以外语为对象的双语教学与以第二语言为对象的双语教学是有较大区别的。如美国以英语为对象的双语教学，实际上是学习官方语言，即一方面学习与生俱来的

母语，另一方面是学习一种生存需要的语言。显然，这种英语的学习应当是富有成效的。加拿大的法语与英语的双语教育、新加坡的本族语与英语的双语教育，也应当比作为外语的双语教育有更为显著的成效。

正规的双语教育在 19 世纪已经开始。早期的双语教学主要限于课堂上，开始出现完全使用目的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活动。但这一时期实质上还是一种泛化的双语教育而非纯正的双语教学。这时期双语教学的主要特征是以殖民地教育为主体，其次为欧洲相关地区。澳门作为葡萄牙的一个占领区，一直以推进双语教育著名，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如伯多禄，他以致致力于为葡人教授汉语而名噪一时，现有纪念碑和由他名字命名的学校以资纪念。^① 20 世纪初，工商业有了重大发展，人类交流更加广泛，外语教育受到广泛关注，自 19 世纪后期出现的直接法教学迅速流行，双语教学逐渐被重视。但当时许多人凭主观测定，认为双语教学会影响语言能力发展。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对日宣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美国政府才发现出国作战的士兵都不懂外语，感到问题严重，于是要教育家提供一种快速外语教学，由此产生了利用行为心理学和交际法进行快速培训的方法，即著名的“听说法”。这种方法把直接法和交际法结合起来。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美国外语教改中，直接教学法、“听说法”以及肢体反应法（TPR）、团体教学法等方法都被运用于双语教育，并被应用于各种目的，如用于同化多种族或推行主流官方语言等等。这时期的双语教学逐步完善，被称为沉浸教学（immersion），以区别于双语教育中的各种不同的应用。

^①参阅刘美冰：《双语人才与精英教育》，澳门基金会 1994 年版；冯增俊、黎义明主编：《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在当时苏联卫星事件的推动下，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战略决策，促进了美国外语教学，获得一些重大成果：一是“直接法”与“听说法”的应用，开始把外语教学推广到对其他科目的学习，使外语成为学习其他科目的教学语言，并发展为“双向沉浸教学”（two-way-immersion）；二是双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被证明是可以提高语言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三是在广泛应用各种方法的基础上，美国逐步发展起一种以结构认知心理学为主的认知教学法，强调认知发生理论及重视认知理解功能，利用母语，主张听说读写综合并进，对双语教育和外语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60 年代中后期，加拿大也受到语言问题的困扰，由于法语受忽视而差点闹出独立来。1969 年加拿大通过《官方语言法》，确定英语与法语都属平等的官方语言，法语区与英语区都积极推广双语教育，特别是采用美国流行的多种方法，政府给予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加拿大也积极地推动对双语教育的研究。

双语教育在战后得到较大发展，从总体上，北美地区理论色彩较浓，但主要是以第二语言为主。令人费解的是，在活跃的研究背后，实践上成果并不很突出。到 80 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反双语教育的新动向，其目的就是要变双语为单语^①。相对而言，欧洲的外语教育、双语教育上的理论较为平淡，但是双语教育开展得富有成效。如芬兰、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高中毕业生和一般居民，几乎都能说上几种语言。因此，国际双语教育经验应当从北美与欧洲的实践中，从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外语教学的实践上进行积极的考察，才能找到真正有助于双语教育发展的新途径。这一工作，既需要外语教育界的努力，也需要教育研究

^①于家太等：“昂茨提案——美国双语教育的论争”，《全球教育展望》2001 年第 12 期。

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国际双语教育的经验，可以给中国推行以外语教育为主的双语教育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在现代社会发展之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都应当掌握两门及以上的语言。

第二，仅仅依靠中小学开设一门外语课，学生很难获得高级外语水平。

第三，在某些相关学科中使用目的语（外语）作为教学语言是提高外语学习的重要途径。

第四，在早期智力开发方面，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优于仅受单语的学生。

三、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①

在所有的古典文化中，教育系统常常被限制在一小部分人的范围内，是建立在一种语言的基础上，与一种具体的语言相联系，以单语教育作为自己的目标的。20 世纪下半叶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有许多教育系统使用两种语言，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把双语教育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相互依赖，这就使掌握和运用外国语变得更有必要，并赋予某些语言以国际交际媒介的地位。

（一）双语教育、双语教学的概念

关于双语教育的概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述。英国教育家 Derek Rowntree 认为“双语教育是培养学生以同等的能力运

^① 本节由罗丹撰写。

用两种语言的教育，每种语言讲授的课业约占一半”^①。《朗曼语言学辞典》认为“双语教育指学校采用第二语言或外语^②教授主课”^③。世界双语教育专家 M.F. 麦凯指出“双语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④。尽管学术界对双语教育的概念表述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双语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整体过程。它含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教学系统，即本族语和第二语言教学体系。双语教学作为实施双语教育目标的主要手段，是运用两种语言为媒介的教学形式，是双语教育的组成部分。

双语教育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双语教育就是指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教育体系。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使用对方语言的教育都可以成为双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进行的教學，就是广义双语教育。如我国目前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或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的小学、幼儿园开展的英汉双语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是特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教育对象，使用其本族语和主流语（族际语）两种语言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系统常常被我国学者称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如

① 《英汉双解教育词典》，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简称 SL）和外语（Foreign Language，简称 FL）在非母语的教学和研究中常被使用。在英语为非母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也常常使用到英语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简称 ESL）和英语为外语（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简称 EFL）两个词。ESL 指学习者的母语不是英语，而在英语的环境中学习英语，此时，英语为学习者的第二语言。EFL 则指在非英语国家学习英语，英语为学习者的外语。在实际教学和研究中，这两个词常常通用。国外常用第二语言代替外语。

③ Jack Richards 等编著：《朗曼语言学辞典》，1993 年版。

④ M.F. 麦凯、M. 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